

新中国的第一个音符

□ 王建柱

1949年10月1日14时30分，北京天安门广场。

华北军区军乐队队长罗浪，提前半个小时就率领军乐团站到了天安门城楼的正前方。作为整个乐团的总指挥，他屏息凝神，微微昂首，盯着天安门城楼。身后，两位分指挥目不转睛地盯着罗浪，再向后，200名军乐队队员盯着分指挥，紧张而急切地等待着那个庄严时刻的到来。

15时整，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随即，罗浪举起指挥棒，沉着地指挥着军乐队队员精神饱满地演奏了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

就是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

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清风店打了个大胜仗，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并俘虏了该军军长罗历戎。罗历戎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被俘后见到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的聂荣臻，开场白就是：“人也被打散了，枪也被缴获了，就剩下一个军乐队了，算是送给老师的见面礼吧。”

当时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乐队队长的罗浪闻讯后非常惊喜，赶紧缠着上级说，请把军乐队留下来，千万不要遣散，以备将来之需。

几天后，聂荣臻叮嘱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的张致祥：“尽快将国民党第三军的军乐队收容过来。”受领任务后，张致祥来到抗敌剧社对乐队队长罗浪说：“赶紧带人把国民党第三军军乐队收容过来，以此为基础，成立我们自己的军乐队。”

罗浪和战友单洪顺一起，历时半个月，在保定、高碑店一带找到了所有军乐队队员。经过组织上政审、鉴定和调查，最后确定留下40人，与抗敌剧社音乐队原有的十多人，经聂荣臻司令员批准，改编为我华北军区军乐队（后来，以此为基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正式成立，罗浪担任军乐队队长兼指挥）。紧接着，罗浪又马不停蹄地到石家庄军校青年训练营挑选了40多人。他们当时所使用的乐器多数是日本人投降后留下的。到了1949年8月，组织上决定由罗浪负责组建一支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之后，他又联合了20兵团各部队的军乐队成员，并收编了北平警察局军乐队20多人，组成了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回忆往事，罗浪老人说：“新成立的这支军乐队可谓来自‘五湖四海’，有解放军的宣传骨干，有起义投诚的旧军人，有收编过来的北平旧警察等，使用的乐器更是五花八门，基本上都是旧制品。”

直到1949年8月初，罗浪才知道

组建的这支联合军乐队将要参加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兵，而是开国庆典。开始还保密，从阅兵副总指挥聂荣臻到阅兵指挥部主任杨成武，都再三强调这次阅兵的意义十分重大，要大家“一切行动听指挥”。聂荣臻还向全体人员发出一道命令：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

为什么不用我们自己的乐曲呢

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罗浪记得在政协一届会议开幕式上，军乐队穿着刚发的新军装站在会场前排演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从主席台上走下来，与第一排军乐队队员们握手。

当《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的时候，负责通知此事的工作人员却忘了通知罗浪由他在开国大典上指挥这一首重要曲目。两天后，罗浪接到了迟来的电话后，立即着手配器，他挑灯夜战，凭着自己对乐曲的理解和顽强的毅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拿下了对代国歌的总谱配器。经过反复计算，罗浪决定，配合国旗上升时间，《义勇军进行曲》要连奏3遍。

国歌确定后，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又采用什么乐曲呢？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9月初，阅兵指挥部就召开会议，几经讨论，都难以定夺。罗浪心里嘀咕着：赶紧定吧，定完了我们好练呀！

当时有部分人主张按老规矩办：采用旧军队的阅兵曲即德国的乐曲；也有部分人主张“一边倒”，全部采用苏联乐曲，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能用“老大哥”的乐曲。

罗浪则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就是要用经改编的我军的某些革命歌曲。新中国自己的庆典，为什么不用我们自己的乐曲呢！况且华北军政大学曾在石家庄搞过一次阅兵式，用的就是经罗浪改编的我军军乐曲，并获得中央首长的肯定。

三种意见争论激烈，哪个也不能轻易否定，这让阅兵指挥部主任杨成武为难了，略倾向于第三种意见的他让罗浪连夜起草了一份文字方案，一并上报到中央军委。那些哼唱了多年的熟悉的旋律获得了中央首长的肯定，聂荣臻批示“同意用我们军队自己的曲子，请五大书记审阅”，毛泽东随即潇洒地挥笔写下了“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9个大字，周恩来批阅“同意主席的意见”。

罗浪当时所报的曲目是《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人民

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等。时光荏苒，这些歌曲至今还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唱。

200人的演奏，没有错一个音符

1949年10月1日15时，令世界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拉开了序幕。罗浪率领着军乐团在13时便进入天安门待命。秋天的北京是最美的，天高云淡，一切都透着喜庆。参加开国大典的军乐团军装和皮鞋都是新发的，就连乐器也都重新喷上了漆，在阳光下闪闪发亮。200人的军乐队面向天安门城楼，站成两个方队，各自以10行横队和10行纵队的宏伟气势奏响同一支威武雄浑的乐曲。罗浪回忆说，我把大小军鼓都安排在第一排，这在当时是一种创造性的思路，是为了展示一种威武整齐的新面貌，是为了形成一种鼓乐喧天的气势，以宏伟的气势等待着党和人民的检阅。此时，毛泽东和开国元勋们正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

突然，罗浪的心又“突突”地跳了起来。当时还没有话压机这类设备，当毛主席登上天安门时，城楼上如何通知罗浪开始演奏《东方红》呢？在排练时，典礼指挥张致祥望着城楼上飘舞的红旗，急中生智：何不用小红旗子在城墙上向罗浪发信号呢？于是张致祥与罗浪事先约定：就用这种土办法发出信号！

14时30分，紧张而又兴奋的罗浪，悄悄瞄了一眼军乐队，只见队员们个个仪表端庄，军姿挺拔。阳光下乐管泛金，乐鼓流银。

14时50分，一直守候在城楼西侧的典礼指挥张致祥，看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谈笑风生，拾级而上。此时，罗浪正紧张地盯着张致祥呢。当毛主席一行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张致祥立即向乐队挥起了红绸子。顿时，军乐队奏响了高昂的《东方红》。这是9月30日刚刚敲定的欢迎曲。15时整，大典司仪林伯渠宣布庆典开始。接着，毛主席以洪亮的声音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当时的气氛既热烈又紧张，司仪宣布“升国旗”“鸣礼炮”后，却忘了宣布“奏国歌”。毛主席的话音刚落，罗浪就准备指挥军乐队演奏国歌，却未听到司仪发布命令。等了大约半分钟后，罗浪按预定的程序，果断地指挥军乐队奏起了国歌，天安门广场上顿时欢声雷动。

司仪紧接着宣布阅兵式开始。军乐队奏响了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步兵、骑兵、炮兵和坦克兵等方队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共和

国年轻的空军也首次驾机掠过天安门广场的上空……虽然军乐队排练时间非常短，但在开国庆典上，200人的演奏，没有错一个音符。

后来，毛主席对军乐队在开国大典上的出色表演十分赞赏，兴奋地说道：“我们国家这么大，天安门又这么大，要有一支千人军乐团嘛！”于是，1951年初，有关部门责成罗浪负责筹建一支千人军乐团。聂荣臻为此批示并专门拨出经费用于军乐团建设。同年7月，军乐团扩编为1000人，罗浪担任团长兼总指挥。

国庆节都会到天安门看一看

罗浪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1937年从马来西亚回国。抗战前期到上海求学，17岁时到达延安，1939年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他说，开国大典是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次大总结、大检阅，是解放区党组织和地下党组织的一次大团圆，也是一次战利品的大展览。

开国大典后，罗浪于1949年底南下，后来调到上海管会文艺处工作。1950年，任上海交响乐团副主任。1951年，罗浪又回到北京，为国庆两周年筹建千人乐队，作为华北军乐团团长、总指挥。他参加了国庆两周年庆典。1952年，罗浪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任团长。此外，他还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军乐学校的校长、训练总监部军事电影处处长、中央广播乐团团长、八一电影制片厂军教制片室主任。他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2002年罗浪被授予第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

罗浪的音乐创作内容十分丰富。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创作的作品有歌曲、大合唱、歌剧等200余首。这些歌曲，成为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军乐曲方面又创作和改编了数十首，如典礼、仪式用曲《东方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分列式进行曲》等。他还为话剧《子弟兵与老百姓》《戎冠秀》，为电影《晋察冀新闻》（一、二、三号）《百万雄师渡长江》等创作音乐，指挥录音。他的作品广为流传，深受欢迎，周恩来总理曾选用他的军乐唱片作为馈赠外国贵宾的政府礼品。

罗浪几乎每年国庆的时候都会到天安门看一看，停一停，回忆往事。天安门广场浓缩着中国的发展之路，当一个个方队踏着他们演奏的旋律走过时，那种激动而自豪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摘自2019年10月31日《解放日报》，原标题为《70年前，他挥舞出共和国的第一个音符》）



李达，1905年生于陕西省眉县横渠镇横渠村。早年曾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后考入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1931年12月，李达参加宁都起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连长、师参谋长、军参谋处处长、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湘赣苏区反“围剿”，参与创建湘鄂川黔苏区和长征，曾获二等红星奖章。1936年起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援西军参谋长。全国抗战爆发后，李达任八路军第129师参谋处处长、师参谋长。1943年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参与创建晋冀豫、冀南、太岳等抗日根据地，协助刘伯承等组织指挥神头岭、响堂铺、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磁武涉林等战役战斗和百团大战。李达还曾指挥林南、道清和安阳等战役。

1945年8月，李达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指挥了太行军区部队的战略反攻。抗日战争胜利后，李达参与指挥了上党、邯郸战役。1946年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1947年协助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进军大别山。1948年起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淮海战役后，参与组织指挥渡江战役和进军西南。

李达智勇双全，战功赫赫，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人民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兼云南区司令

战功赫赫 智勇双全

□ 李浩

员，参与领导西南地区歼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及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回国后，李达历任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计划部、监察部部长，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93年7月12日，李达在北京病逝。（摘自2019年11月1日《光明日报》）

彭加木：心系科考 奉献边疆

□ 李雄鹰

彭加木原名彭家睦，1925年出生在广东省番禺县。1949年5月参加工作，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综合科委员会任助理员、助理研究员。195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中国科学院准备组织综合科学考察委员会，彭加木主动放弃去莫斯科学习的机会，请求赴新疆考察。请愿书中，他把自己的名字“家睦”改为“加木”。他说，他要跳出小家庭，到边疆去，为边疆“添草加木”。在此后20多年中，彭加木先后15次到新疆科考，3次进入新疆南部无人区罗布泊。1964年和1979年，彭加木两次到罗布泊外国做科学考察，发现了大量的钾盐、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貴重资源。

1980年5月，彭加木担任罗布泊科考队队长，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罗布泊科

考。6月5日，科考队第一次穿越罗布泊核心地带，打破了“无人敢与魔鬼之湖挑战”的神话。6月11日，已经完成任务的科考队休整后，准备沿古丝绸之路南线再次横贯罗布泊地区。但是途中遭遇了沙尘暴和数次陷车，3天才行进了150公里，保存的水也开始变色发臭。大家决定向最近的解放军部队基地求救。当时，求援送水需要花费六七千元的资金，这是一笔庞大的数目，彭加木为节约起见，决心继续寻找水源。

6月17日中午，驾驶员王万轩打开汽车车门时，发现了一张用铅笔写的字条：“我往东去找水井，彭。6月17日，十点三十分。”但直到下午，彭加木还没有踪影。随后展开的4次大规模地毯式搜救均无结果。彭加木为我国科考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化成了罗布泊永远的丰碑。

（摘自2019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

“神威罕及惟关将，圣手能医说华佗。”凡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一代名将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关羽的意志力让人惊叹。

“《三国演义》毕竟是文学作品，难免有虚构的成分。然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刘伯承元帅，却在重庆留下了一段比‘刮骨疗毒’更加惊人的真实故事，并因此被誉为‘军神’。”刘伯承同志纪念馆管理处文物科科长付世权向我们讲述了刘帅“军神”称号的来历。

不幸受伤的川军将领

时光回溯到1915年12月底，袁世凯公然宣布复辟帝制。为保卫辛亥革命成果，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斗争。

1916年初，刘伯承奉孙中山之命回到四川，组织武装起义。“当年3月20日，为响应云南护国军入川，刘伯承指挥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在丰都与北洋军阀部队激战。敌军人数是护国军数倍，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付世权介绍，刘伯承勇当先，亲临第一线指挥。不幸的是，在攻打城门时，遭到敌人疯狂射击，刘伯承连中两弹，一颗擦过颅顶，另一颗击中右侧太阳穴，从右眼眶飞出，刘伯承当即昏倒在地。

当刘伯承从昏迷中苏醒，发现自己躺在死人堆里。他感到身体难以动弹，又闭上了眼。好在天黑之后，几

刘伯承：意志如钢的“军神”

□ 黄琪琪 丁 颖

位护国军士兵在乱尸中找到了他，将他抬进城里邮局内休息，又敷了些草药，对他进行了简单救治。当时，重庆北洋军阀当局在各地张贴榜文，悬赏捉拿刘伯承。刘伯承在涪陵隐蔽了一个多月。后来，等到对革命党人的清查逐渐松弛下来后，他才秘密来到重庆治疗，藏匿在王尔常兄弟家，但却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由于早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刘伯承的眼伤日益恶化，如果不尽快动手手术剔除眼眶内的腐肉，后果难以想象。

拒绝麻醉，震惊医生

军阀对革命党人的清查逐渐松弛下来后，刘伯承才决定开始寻找医生治疗眼伤。经过多方打听，刘伯承在重庆临江门找到一家私人诊所。当时诊所里的沃克大夫是一位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军医，经验丰富，尤其擅长外科手术。但这位医生很有个性，遇到伤病员畏痛呼喊，便十分鄙夷，甚至冷嘲热讽，让人下不了台。

经过仔细检查，沃克大夫发现刘伯承的伤势十分严重。而眼眶这个位置，由于内部的血管、神经都非常复杂，手术中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沃克大夫经过深思熟虑，慎重地提出了手术方案：先去除腐肉，施行全身麻醉，做好输血、输液等急救准备；眼部伤口愈合后，再安装假眼。

手术前一天下午，沃克大夫来到刘伯承面前，对他进行手术前的最后检查。检查完毕后，刘伯承突然问道：“打了麻醉药，以后对大脑神经功能是否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听到这个问题，沃克大夫愣了一下。看到沃克大夫这样的反应，刘伯承也陷入了沉默，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头对沃克大夫说，自己以后还要工作，这次手术就不用麻醉了。

听了刘伯承的要求，沃克大夫大吃一惊，连声嚷道：“啊！不行！绝对不行！不麻醉？简直是异想天开！这种手术我是不敢做的。万一发生了意外怎么办？我的诊所以后还开不开？”

见医生不肯冒险，刘伯承再次坚定而恳切地说道：“沃克大夫，请您放心好了。不管发生什么意外，我不会

要您承担任何责任。”

沃克大夫仍然连连耸肩，摇头说道：“真的吗？真叫人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即使我敢做，你也受不了！”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刘伯承的三弟刘叔禹前来探望他。看到三弟进来后，刘伯承忙喊道：“老三，你来得正好！你记住，这次沃克大夫给我做眼晴手术，是我一再要求不用麻醉的。不管发生什么事，全部由我本人负责，与沃克大夫没有任何关系。”刘叔禹点头答应了。沃克大夫想了一想，做出了让步：“刘先生，不全身麻醉，就局部麻醉吧。不然，你会痛得受不了的。”

面对沃克大夫的退让，刘伯承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无奈之下，沃克大夫只好把刘叔禹叫出去，向他强调使用麻药的必要性。但当刘叔禹回到病房，向刘伯承转达沃克大夫的观点时，刘伯承依然坚持己见，坚持不用麻药。

面对固执的大哥，刘叔禹叹了口气，走出门外，对沃克大夫原原本本地转达了刘伯承的要求。听到刘叔禹的话后，沃克大夫长叹一口气，答应了刘伯承的请求。

72刀见证“军神”的诞生

翌日，刘伯承来到了手术室。面对这个固执的病人，沃克大夫苦笑着说：“我从欧洲到亚洲，为白种人、黄种人做过成百上千例手术，像刘先生这样手术不用麻醉的，我还从来没遇见过。”

听到沃克大夫的话，刘伯承摆了摆手，坦然地说：“沃克大夫，那就请你在我这个中国人身上做一次试验吧。”说完这句话，刘伯承便躺上了手术台，准备迎接手术。

手术的第一步是清除腐肉。沃克大夫在他眼眶划了一刀，刘伯承猛然震动了一下，不由得狠狠地咬住了手帕，捏着床单的手上暴起了青筋。

“可以吗？”沃克大夫担心地问。面对沃克大夫的关心，刘伯承微笑了一下，镇定地说：“可以，你继续吧！”

听到刘伯承的回答，沃克大夫继续投入到手术之中。随着手术的进行，沃克医生的额头沁出了又细又密的汗珠，刘伯承则紧紧地咬着手帕，捏紧床单，一声不吭，浑身汗如雨下。三个小时后，这台手术才宣告完

成。不知是疲劳还是紧张，沃克大夫觉得自己差点虚脱了。但他依然不忘对刘伯承说：“刘先生，我真担心你会晕死过去。”

刘伯承带着疲惫的微笑说：“怎么会呢？我一直在数你下了多少刀呢。”

沃克大夫惊呆了：“是吗？多少刀？”

“72刀。”

听完刘伯承的话，沃克大夫失声叫道：“上帝啊！您哪里是人，分明是一块会说话的钢板……”

当时在手术现场陪伴的王尔常先生后来写下关于刘伯承元帅的回忆文章，对刘帅的英雄气概叹服不已：“昔华佗之疗关羽也，服以全身麻醉之麻沸散，仅施刀于臂耳。将军两次疗伤，余皆亲侍左右，目睹其沉雄坚毅，令西医瞠目，非超关羽千百倍乎？”

后来，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刘伯承的眼伤痊愈了。由于已经和沃克大夫成为了朋友，刘伯承在离开前也把自己的身份告知了沃克大夫。从此，沃克大夫一有机会，便会向人提起这次难忘的经历，他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这个刘伯承，不仅是个标准的军人，而且简直可以说是个‘军神’！”

（摘自2019年11月4日《重庆日报》）

